

近代青海的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

田旺杰

【摘要】 本文叙述了近代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论述了马步芳家族与天主教相互勾结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揭露了二者的侵略本质。

【关键词】 近代;青海;天主教;马步芳;家族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05)01—0124—04

虽然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时间不长、影响力不大,但它的传播还是对青海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明清时期青海的天主教比较重视,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有房建昌的《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平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①、《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②;而对近代以来天主教注意不够,研究成果也不多。本文拟就近代时期青海的天主教作一简单梳理,望学者、专家指正。

一、鸦片战争以来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1840年之后,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度活跃起来。传教士纷纷深入我国内地进行传教。1878年(光绪四年),罗马教皇派神父进入甘肃传教。之后,基督教牧师进入西宁传教,内地会的教士敦巴、格达二人到皋兰传教,定皋兰、西宁、宁夏三处为布道区,设西宁总堂。在丹噶尔厅、贵德厅设福音堂。1891年(光绪十七年),基督教外籍教士、牧师等进入西宁传教,前在城内北斗宫街设临时福音堂,后在西教堂街修建新堂。随着传教士人数的逐渐增多,传教地区范围的扩大,为进一步传教,光绪五年(1879年)罗马教皇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其中甘肃为第二教区,青海地区属甘肃省甘北传教区。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英美籍教士王立伦、克省悟、蓝正德等,通过汉口英美领事馆,先后来西宁传教;其后又有白立美、海英光、连福州、海春深、白嘉礼、袁大福等,分别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教义。这时传教士共有20多人。宣统二年(1910年),甘北传教区派比利时籍神甫康国泰来西宁,此为近代天主教传入青海之始。他来青海以后,就以送沙厄等贿赂形式与当时的青海统治者马麒进行联系,在取得马麒的支持以后,便在西宁大通等地开始传教,先在西宁南街建立了天主堂。在他的宣传下,1913年后,西川的猫尔沟、扎马隆、黑咀子、彭家沟,北川的后子河,南川的鲁沙尔、星家庄,乐都的东关、姜把沟、丁家庄、高庙,互助的威远堡、老虎沟、白崖、羊圈堡、新元堡、甘家堡、总寨、华林沟,大通的东大街、新添堡、陶家寨,湟源的东街等地,先后设立了天主教堂。1922年康国泰回国,又调来神甫曲同慧(帝国主义分子)。此后,外籍神甫不断来青海传教,由于得到了地方统治阶级马氏家族的支持,因而发展很快,天主教堂不断增加。1915年(民国四年)罗马教皇派主教濮登博在兰州主持甘肃教务。1929年(民国十八年)德籍主教夏思德到西宁主持会务,设青海教区。此后陆续来西宁的传教士有德籍吕左光、德公网、毛儿次,匈牙利籍戴国福等人。其间中国教徒亦有升位神父的。1932—1934年这段时期内,他们利用搜括来的钱财,对原有的教堂又修理一番,并于1932年在加牙建立天主堂。至1934年,青海全省已建有天主教堂20余座,信徒达3200余人。这与以下文献材料记载相一致。

青海虽僻在西北,教育落后,然宗教则已深入,佛教、回教有悠久历史无论矣。即耶稣教

亦早遍于各地，不仅省会、县城，而各乡镇亦多有。此项教会之设立，其精神可佩，其力量之深入民间，亦可虑也。

西宁 省城南街，西川彭家寨，南川加牙星家寨，扎麻隆拉沙尔、黑咀尔、猫尔茨沟、后子河每地均有天主堂一处，计共有天主堂八处，信徒共有 965 名。省城西街、后子河等地，共有邪教福音堂三处，有教徒 108 人。

湟源 县城东关有天主堂一处，信徒 120 人。又县城有邪教神召会一处，信徒 13 人。

大通 县属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地各有天主堂一处，共有天主堂三处，信徒共 740 (648) 人。又县城有邪教内地会一处，信徒 45 人。

互助 县属之甘家堡、新元堡、羊圈堡、白崖堡、县城东关等地，共有天主堂 5 处，信徒 1120 名。又县城有邪教内地会一处，信徒 33 人。

乐都 县城东关、高庙子、乐巴沟、定家庄等处共有天主堂 3 处，信徒 250 或 350 名。

化隆 县城内马坊街有邪教内地会 1 处，信徒数未详。

贵德县属 西关厢居家沟有邪教内地会一处，教徒数未详。

门源县城内有内地会一处，信徒数未详。

全省共计天主堂 20 处，信徒 3203 人，邪教福音堂 2 处，神召会一处，内地会 5 处，信徒共 200 余人。无论新旧教，信者多为汉人，因蒙藏民众皆信仰喇嘛教，回人皆信仰回教，青海民族复杂，宗教亦复杂，可知边疆一切非简单也。^③

另一条材料记载为：

邪教在青海势力甚微，然在旧西宁道所属各县中，传道甚久，信徒亦不少。据调查，天主堂共 20 处，其教友大通县男 441 人，女 302 人；西宁县男 154 人，女 110 人。其它各县千数百人。共计 3200 余人。邪教堂 8 处，教友大通县男 48 人，女 28 人；西宁县男三十三人（此有误，应为 33 人），女 3 人。其它各县数十人，共计 197 人。^④

由此看来近代以来天主教的传播是比较迅速的。

1938 年调德籍主教夏思德（帝国主义分子，1953 年被驱逐出境）来青海。夏思德与当时的马步芳来往甚密，而马步芳也想靠拢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在这一时间的传播是比较快的，在 1938 年、1948 年又分别在西宁下朝阳和贵德县建立了教堂。他们凭借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凭借着青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在青海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传教”活动。到解放前青海有天主教堂 33 处，教徒 3976 人，并附设一个医院、两个诊疗所；共有基督教堂 9 处，教徒 640 多人，也附设了一个医院、两个诊疗所。

天主教传到青海以后主要在汉族聚居的西宁、湟中、湟源、大通、乐都、贵德、互助、同仁、化隆等地传播，信仰者也多为汉族人民。西宁以南大街的天主堂为中心，分设教堂于西宁附耳寺沟、鲁沙尔、扎马隆、彭家寨、黑嘴尔、海子沟、后子沟、毛儿茨沟、加牙、星家庄等村，信徒达一千人左右。大通以县城东大街的天主堂为主，分布于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村，信徒有八百多人。乐都以县城东关的天主堂为主，分布于高庙镇、定家庄等，信徒有五百多人。湟源以县城东关的天主堂为主，信徒有二百多人。互助以县城东关天主堂为主，分布于甘雷堡、新园堡、羊圈堡、白崖堡等村，信徒有一千四百多人。蒙古、土族等少数民族中也有信仰的，不过只是个别的，人数并不很多。为迎合王公、千百户等人的心理，宣传入教，天主教主要通过医病、交易等手段扩大接触机会，加大宣传。同时传教士为了引诱蒙古上层信仰天主教，专门设了“蒙古店”来接待蒙古族的王公牧民。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收集蒙、藏、土等民族的文物资料，调查蒙、藏、土等民族社会情况，以便进一步向这些地方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和伪蒙藏委员会的上层人物勾结，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将来在蒙藏地区传教。神父在传教时，多施小恩小惠，联络情感。城市则争取豪绅地主以及工商、手工业和无职业的流民。农村多吸收中农以上阶层人士参加。天主教的经费，由罗马教廷梵蒂冈供给。仅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拨发经费法币二亿四千六百多万元。各教堂购置田地、收租、放高利贷，月息高达十分至十五分，进行重利盘剥。在修建教堂及其附近医院、学校等，给教徒少发或不发工资，仅供给膳食。

各地天主教堂的主持人多为德籍神甫，也有少数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波兰籍和中国籍神甫。至 1949 年，青海地区的天主教外籍神职人员 22 人，修士 3 人，修女 8 人。此外，各天主教堂还设有帮

助神甫处理日常事务的“先生”，多为粗通文墨的当地人。

天主教自称为修会，这些修会全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属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青海的天主教由“圣言会”传布，下有男女教俗修会帮助传教。教派主要有圣言会、圣神会、圣母永助会、圣家圣衣会、公教进行会、童子圣体军会等。信徒以前三者为多，后三者人数甚少。

二、天主教的手段

天主教立足青海之后，依仗青海统治阶级马步芳家族的支持，横行霸道，采取各种手段强迫人民入教，主要有经济利诱；设立医院、诊疗所、婴儿院；包揽诉讼法律等。同时天主教神父经常干涉地方行政，扩张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甚至欺压人民，掠夺财产，奸淫妇女，关押群众，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怒。

经济利诱的手段。青海解放以前，青海人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相当沉重。马匪为了维护其统治疯狂地向人们勒索，设马款、门牌钱、过桥钱等各种苛捐杂税几百种，如果不缴或交不起就遭到毒打。因此人们在无力缴纳的时候，只好向教会借钱。教会一方面用入教来作为借钱的条件，另一方面则用高利贷的罗网来束缚群众，使其失去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依赖教会。过去在互助县就有整个村子都信天主教的，其原因就是缴不起“马款”，由天主教堂包下来，而后全入教了。其它各地类似的情况也不少。

设立医院、诊疗所、婴儿院和学校。由于青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得病之后无钱看病，而且医院诊疗所数量少，特别是在农村几乎是个空白。传教士们可谓是“体察民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在青海办起了医院、诊疗所和婴儿院，采取免费或少收费的策略来利诱人民信教。许多人就是因为贫穷付不起药费而不得不信教。医院以公教医院最为著名。公教医院设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分内外两科。医院及看护人员多为信徒及修士、修女，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宣传教义。医院药物价格较廉，对许多家庭妇女及贫困人们，常常免收药费，诱惑入教。公教医院附设育婴院一处，可收容 30 多人，但由于传教士的疏忽和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所收婴儿多半夭亡。针对当地文化教育落后、学校数量少、学生上学困难等状况，传教士们办小学，吸纳贫困孩子入学，教授教义。从小对孩子进行灌输天主教教义是最好的方法。在设立的学校中，以在西宁设立的培英小学、公教医院附设的育婴院为最著。培英小学于 1924 年（民国十三年）附设于南大街天主堂内，招收学生多为信徒的儿女，以物质作诱饵，历年陆续增加到 200 多人。到 1941 年（民国三十年），国民党政府收回全国教育主权，培英小学乃改为经学院，这些学生便整日诵读念经。天主堂各分处也附设小学，有西宁光华小学、黑嘴堡小学、互助苏家堡小学、乐都李家庄小学、定家庄小学、西宁公教医院女子小学。贵德、化隆教会也设学校。

包揽法律。由于帝国主义传教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与反动统治者紧密勾结，所以就有可能通过包揽诉讼的方法来利诱一些人入教，解放前就有好些人是为了打赢官司而入教的。在诉讼时往往受到天主堂的庇护和说情干预，这就成为落后群众盲目入教的诱饵。当时有人在诗句中指责说：亲民惟邑宰，理讼坐琴堂，突尔来神父，无端作主张，违心翻皂白，信口人任雌黄，安怪嗤嗤者，纷纷入教忙。于是奸民健讼者，都入教会，教徒数目，与日俱增。

三、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的相互勾结

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与马步芳家族勾结，进行各种间谍活动。马步芳为了其反动统治让法籍神甫考来思（帝国主义分子）在天主堂内与其爪牙马寿昌、高文远翻译法西斯德国步兵操典，以供其训练匪军。而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为了迎合马步芳的心理，在天主教的培英小学内，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青海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就配合蒋介石的这一反动行动进行宣传，表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如湟中县黑嘴村天主堂帝国主义神甫就召集教徒，游行示威，支持蒋介石反动内战。1922 年荷兰籍神甫胡肯堂在湟中黑嘴村贿通马匪官兵，骑马到地里捆打群众，强迫到教堂听经“望弥萨”，不愿入教者，被吊打罚跪数十人。德籍神父夏思德尤为活跃，他和马步芳集团早有勾结，不惜献媚送礼，多方谋求马步芳父子的欢心。他们先给马麒送望远镜、手枪等物，后来为投马步芳所好，送给军用品和其它物资，如手枪、军刀、电炉、收音机、发电机、西方用具、钢丝床、汽油、美酒以及国外糖果、滋补药品。接着他们籍此大量吸收教徒，建立分支机构，对

地方行政、司法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地方工作人员不敢得罪神父。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马步芳在进行反共战争中,这些神父号召教徒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支持,并举行礼拜、祈祷;教堂医院的医生、修女也为马家部队医治伤病。在与马步芳勾结往来中,神父楚华南送给马步芳一万五千硬币的礼品。马步芳也给天主教捐献木材修建公教医院,支持神父段恩辉强租黑嘴子小学为教堂,夺取学校基金,租期为99年;并支持神父胡肯堂,强迫群众入教。互助的天主教士,在右宁寺观经庙会上,到处追逐妇女,照摄影片,进行调戏,以致引起土族人民的众怒,打碎了教士的摄影机。后由马家集团支持,恣办了当地人命令捐款,才算了事。1947年、1948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在合水、子午巔、西峰镇进行反革命战争的时候,青海天主教主教夏思德为了向马继援献媚,换取马对天主教在青海进行罪恶活动的支持,曾送马一面“剿匪(指共产党)功臣”的锦旗,表示支持其反动行动。马步芳对天主教不仅在政治上支持,纵容其不法行动,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很大的方便。1945年天主教修建公教医院时,马步芳亲自赠送松木350根,表示对天主教的支持。此外马步芳与夏思德一起照相,或者与神甫坐在一起,让教徒们磕头,这些都表明他们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人民。

天主教在马匪的支持下,在青海大肆开展了各种侵略活动。他们以传教为名测绘青海地图,搜集有关地理、水文、气候等资料。1934年德籍神甫费西那(帝国主义分子)以“国际考察团的名义”,携带测绘仪器在天主教堂内测绘地图。当时天主教主教夏思德对此行为进行保护,费西那工作月余后,才由德籍修士护送回国。他们的这一行为曾经引起了西宁广大教徒的不满,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夏思德却对群众的这一正道行动加以辱骂,说“教堂是德国人的,中国人无权过问”,用尽了各种威胁的手段才平息下去。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天主堂的德籍神父海国春,到互助、大通测绘地图,拍摄青海古迹及妇女小脚照片,收罗了许多古代文物,写了一本《汉族文明进化史》。有些神父还经常进行调查活动。

四、天主教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是马步芳家族一贯的手段——利用各种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天主教主要在不信教的汉族中传播,这样一来,马步芳就可利用天主教来控制信奉天主教的汉族,对自己的统治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二是马氏家族更看好的是利用各个国家的传教士来与外国取得联系,得到他们在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支持;并利用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比较广的优势为自己提供各种信息。而且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华北、东北相继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国民党逐渐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北。这一重大转移,不仅引起国人对西北,特别是青海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外国人对青海的瞩目。帝国主义为了不暴露身份和他们的野心,就通过派传教士来到青海进行间谍活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当地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不惜代价,用重金和军用物资贿赂当地最高统治者。而马步芳家族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也不惜以牺牲当地群众的生命作代价。

三是天主教抓住了一些人们的心理,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并通过诱饵和强迫的方式迫使人们入教。如通过包办诉讼入教的人数就比较多,还有办学校、医院进行诱导和借钱强制入教。这些问题都反映了青海近代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在马步芳家族的独裁统治下,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没有一个能看到光明的地方,而天主堂似乎是一个讲公道、替人民说话、办事的地方。这样,许多人在传教士的诱骗下入教。

【注释】

- 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
- ②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
- ③开发西北,1934,1(4).
- ④西北考察记[J].开发西北,1935,4(6).

【参考文献】

- [1]宗教志·天主教、基督教(手抄本)[M].现藏于青海省图书馆。
- [2]青海文史资料,第九辑[C].

四、收购双方“强制性的买卖关系”应为经济合同

“强制性的买卖关系”的定位兼具上述两种定位的要素。即开展土地收购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的过程,在服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储备机构享有“强制收购权”和“优先购买权”。但在具体的收购价格的确定上,应按照被收购方经济权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确定,既不是完全服从于政府的决定也不是完全采用市场交易的价格。这种土地收购价格的确定方式也符合国际惯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为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城市土地再开发,都建立了具有强制性的土地储备机制。土地的收购价格以土地现用途为依据,规定土地优化利用所带来的收益归土地所有者享有。法国、德国、瑞典等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的土地管理模式就是如此。

按现在我国开展土地储备的城市的通行做法,政府规定用于储备的土地范围后,对可收购的土地由土地储备机构与原用地者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储备机构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后取得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是土地收购行为的法律表现方式,对于它的性质人们有不同认识。依照上述分析,这既不是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的自由买卖关系即民事合同关系,也不同于政府机关完全依靠行政力量,不考虑对方主体的权利与利益相一致而进行的强制买卖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合同”关系。

经济合同,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一定经济目的,直接体现政府意志,由政府规定基本合同条件的合同。经济合同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先是现代国家的职能变化与角色演变。现代国家全面涉入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管理、监督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夜警国家”、奉行“不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之信条的国家,转变为介入各方面社会关系的国家。它承担的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和国家所有权的经济职能日益突出。国家对社会经济管理的深化、范围的扩大,导致将更多的经济关系包括合同关系纳入行政性规范的调整;而国家意志上升引致合同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国家以所有权为依托从事经济活动,缔结或参加合同关系时,由普遍意志对合同关系的一般限制,进一步发展为将其普遍意志具体化,落实为具体的合同条款。经济合同的本质,是国家或政府在经济活动或经济管理,将其意志直接体现到原本是私人自治的契约关系中去。其基本

特征是:其一,经济合同的基本条件由政府规定或确定。其二,经济合同的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的机构或政府授权的代理人,或当事人双方均由政府指定。其三,具体国家机关或政府代理人作为合同一方时,同时又是合同履行的管理监督人。其四,对经济合同的调整同政府及其运作机制有密切联系。^[5]

由上述对经济合同产生背景和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就是经济合同。它是在国家作为土地资产的所有人而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产生的。一方面,政府机构或其委托的机构出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与被收购人达成收购协议,政府在合同中起主导作用,能够决定收购的进行与否。土地储备机构所享有的有限的强制力应限于“必要”和“必需”,确保是为了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对方当事人作为市场主体享有的经济利益,在收购价格上不能背离市场和经济规律,要兼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合同的基本条件由政府规定或确定,同时又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管,但双方都必须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违约救济和实际补偿等原则是政府也不能违背的。因此,作为“公”、“私”因素交融的经济合同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的根本属性,这也是土地储备制度的一大创新。澄清这种认识对于土地收购储备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为政府机构行使行政权力设置了界限,又为被收购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经济合同作为“异化的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与民事合同、行政合同一道,在各自的领域调整经济活动。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中的土地收购行为应界定为“强制性的买卖关系”,其性质是典型的“经济合同”。

【参考文献】

- [1][2] 欧阳安蛟. 中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理论与实务[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106、107.
- [3] 余凌云. 行政契约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2.
- [4] 王凌松,宋义春,佟月强. 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当代经济研究,2002,(7).
- [5] 史际春,邓峰. 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关于经济合同的重新定位[J]. 法学研究,1997,19(3).

【作者简介】 王小龙,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房地产法和土地法。

(上接第 127 页)

- [3] 周振鹤. 青海[M].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
- [4] 崔永红等主编. 青海通史[M].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 [5] 甘肃省图书馆编. 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册)[C].
- [6] 青海历史纪要[M].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田旺杰,男,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近现代史、民国史。

近代青海的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

作者: [田旺杰](#)
 作者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
 刊名: [青海社会科学](#) CSSCI
 英文刊名: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5, ""(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宗教志·天主教、基督教\(手抄本\)](#)
2. [青海文史资料](#)
3. [崔永红 青海通史](#) 1999
4. [甘肃省图书馆 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册\)](#)
5. [青海历史纪要](#) 1987
6. [查看详情](#) 1987(04)
7. [查看详情](#) 1989(03)
8. [查看详情](#) 1934(04)
9. [西北考察记](#) 1935(06)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李臣玲, 贾伟, LI Chen-ling, JIA Wei 试论青海近代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对近代民族教育的影响 - 民族教育研究](#)2005, 16(5)
 社会结构是社会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和联系方式。各要素间全方位互动, 教育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要素也参与其中。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汇聚的地区, 在近代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结构特征, 使得青海近代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制约, 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显现出了多元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
2. 期刊论文 [李臣玲, 贾伟, LI Chen-ling, JIA Wei 浅论近代青海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及其原因 - 青海民族研究](#)2005, ""(2)
 近代是青海女性社会地位发生变迁的时期, 本文从女性形体的转变、女性教育等方面, 论述了近代青海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
3. 期刊论文 [崔永红, CUI Yong-hong 近代青海举办垦务的经过及意义 -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3(2)
 清宣统年间, 朝廷曾拨款在青海境内进行垦荒。清廷在青海举办垦务之动议与筹划青海建省有关, 光绪皇帝否定了在青海即行设省的建议, 采纳了朝臣中暂缓设省、先行试垦的意见, 于是就有了大规模举办垦务的举措。民国时期, 政局多变, 但青海垦务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只是成效不大, 垦务机构逐步变为地政机构。20世纪30~40年代, 国民政府曾两次作出决定, 拟在柴达木大兴兵屯, 以为开发西部的标志性行动, 但因种种原因均未获成功。
4. 期刊论文 [胡铁球 近代青海羊毛对外输出量考述 - 青海社会科学](#)2007, ""(2)
 本文根据地方志、实业统计、海关统计、征税局统计及学者有关青海羊毛输出量的记载, 采取估计推算、互相核对方, 最后确定了近代青海各个时段羊毛输出的基本情况。最后的结论是, 青海近代羊毛输出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平稳发展、繁盛、急剧衰退、恢复性繁盛、持续萎靡等六个阶段, 其输出量是在250万斤到2000万斤之间波动, 起伏异常。
5. 期刊论文 [纪小春, Ji Xiaochun 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 - 青海社会科学](#)2007, ""(2)
 1926-1949年是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艰难初创期和发展期。在此期间, 青海地区受制于马麒、马麟、马步芳为首的军阀专制统治之下, 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新闻事业也随着全国新闻发展的影响开始艰难起步。虽颇多磨难, 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打破青海的专制封闭、传播各种文化知识、交流时代信息、开阔人们的视界, 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6. 期刊论文 [牛文春 近代青海行政建置的一元化轨迹 - 攀登](#)2003, 22(1)
 近代青海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步伐, 农、牧、工、矿、商各行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 也使得整顿青海行政体制的步伐加快, 逐步消除了因农牧区及民族、宗教不同而造成的行政管理上的多重性。确立了行省, 并不断完善, 使青海纳入中央的一元行政管理体制之下。
7. 期刊论文 [秦永章, QIN Yong-zhang 近代日本人在青海地区活动述略 -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2(4)
 20世纪上半叶, 日本当局对青海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渗透活动, 其中秘密派遣特务人员刺探情报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对这一时期相继潜入青海地区的7名日本人的活动做了简要叙述。

8. 期刊论文 [马安君, MA An-Jun 20年来近代青海商贸研究综述 -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近代青海商贸研究20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对相关成就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研究中出现了内容不均衡、拓展性研究欠缺、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今后应注重史学理论与史料的紧密结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进行创新研究。

9. 会议论文 [崔永红 近代青海举办垦务之始末](#) 2005

近代以来,随着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该地垦荒业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今甘、宁、青、新、内蒙古等省区的大量荒地得到垦辟,这些荒地或原为纯牧区之草原,或原为半农半牧区的草场。近代西北地区的垦务,有的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有的则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对近代西北垦务的研究,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研究内容之重要组成部分。

10. 学位论文 [勉卫忠 近代\(1895-1949\)青海民间商贸与社会经济的扩展](#) 2009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青海在前近代各民族长期是农牧分治的,从唐宋开始,历代统治者制定“茶马互市”以限定农牧民之间的商贸交往,清前期国力强盛,将整个青海蒙藏牧区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停止茶马互市,沿袭千年的官方专营的“茶马制度”的种种限制被取消,从此自由的民间贸易一直发展到民国中后期。民间贸易的自由,商人的自由迁徙,使原来彼此孤立的农牧经济区域开始联系、结合,引起了青海内部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演变,遂促使青海东部与西部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与牧业经济文化区域在青海小环境中结合,对青海这一多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借助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及近年来研究领域的崭新视角,以清朝、民国时期,国家—地方社会变迁场域中的青海民间贸易兴起的社会因素为背景,以1895-1949年间青海民间贸易和地方民族经济扩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线,采取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探讨以各级城镇商贸市场为依托,由各族商人而主导的民间商贸的变迁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揭示其对青海地方民族社会经济扩展的历史绩效。

本文认为,1895年始青海民间贸易快速升温的巨大动力则是皮毛贸易“引擎”带动,在其带动下清前中期发展起来的民间贸易作为特殊的商品流通方式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应地发生了变迁。皮毛贸易的兴起,青海农牧区自然经济逐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于是,伴随着农牧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青海地区旧有的经济结构不断分解,新经济因素不断滋长,逐步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城市市场,以寺院城镇、军事城堡、县治所为中心市镇市场,以集镇为基本市场的多层次城镇市场结构,并逐渐转化为开放的、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在羊毛贸易繁荣带动之下给青海传统的商人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巨变,从事商贸的商人既有传统商人的延续,又有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因素影响下的商人的转变及其壮大。回族官僚商业资本逐渐兴起,到民国末期逐步形成垄断商业,民间商人依旧顽强的坚持着商贸活动。这一历史时期,省内外汉族商人、回族商人、藏族商人和寺院商业、洋行等,他们或为行商、坐商,或为批发商、零售商、小商小贩,或从事超载行业、大小行业商铺(店)、歇家等行业,支撑着近代青海民间商贸的正常运行机制。

伴随着民间商贸的不断扩张和兴盛,以城镇商贸为依托,以各族商人为主导的民间商贸在农牧区的大规模开展,使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也在日益增强,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共生,更为重要的是自由的民间商贸给青海各民族的产业结构、从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由传统迈向近代化转变带来了机遇,并为近代青海各民族经济扩展提供了一定限度的空间,有力地推动了青海地方民族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遂使青海东部与西部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与牧业经济文化区域在青海小环境中结合,为近代青海建省奠定了物质基础,并走上了一条因商而兴的特殊城镇化道路。本文对民间商贸与民族经济发展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青海农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开发及城镇化发展的决策思考,为实现藏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加快青海藏区和全省发展、增加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福祉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shkx200501029.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36e660fd-3e51-4a95-8b92-9e4d007f6e6d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